

新四军在盐城：

谱写华中浴血抗战的壮丽史诗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八十多年前,卢沟桥上炮声隆,中华半壁山河破。全面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的铁蹄踏碎华中大地的宁静。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高擎抗日旗帜,坚定贯彻中共中央“发展华中”战略,东进北上,驰骋苏北,开辟盐阜,横扫敌顽。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浴火重生,重振军威,迅速成为一支所向披靡的“铁军”雄师,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盐城,这座有着两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海滨古城,不仅见证了新四军的悲壮历史和不朽传奇,更凭借不屈与坚韧成为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坚实依托。在敌机轰炸的焦土之上,在芦苇荡的隐蔽战壕里,抗日军民血脉相连,生死与共,同仇敌忾,抗击侵略。新四军以赤诚与担当,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华中的人民长城”,谱写了坚持华中浴血抗战的壮丽史诗。

一 历史性会师在盐城：基本实现“发展华中”战略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指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即将到来,敌后游击战争将成为抗战的主要形式。全会确定了敌后抗战的总战略方针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为加强党对华中工作的直接领导,会议调整了华中党的领导机构,组建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1939年4月,毛泽东指出“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

为贯彻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与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共同商定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随即,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迅速实施战略展开,从皖南挺进江南,开辟江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华北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中共中央加快了进一步发展华中的步伐。在选择华中发展方向时,刘少奇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坚定地选择苏北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突击方向。1939年12月,他致电中共中央,着重指出: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边发展。”中共中央同意了刘少奇集中力量发展苏北的建议。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在安徽定远县附近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对新四军发展方向、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等一系列问题作出重要决策。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明确要求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建立巩固根据地。3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八路军应迅速增援新四军的指示。在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正确指示和刘少奇的亲自部署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继续东进北上,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主力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形成南北合力发展的良好态势。8月,黄克诚率领改编后的八路军第五纵队,进军淮海地区。不久,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率主力向黄桥新四军发起进攻。八路军第五纵队奉命南下支援新四军,从战略上配合呼应。在八路军第五纵队挺进阜宁、盐城时,陈毅所率的新四军已独立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与苏北新四军第二纵队两部先头部队在东台以北刘庄、白驹之间的狮子口会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此次陈毅、黄克诚两军大胜,苏北大部为我占领并连成一片,此为华中最大一块根据地,对全国有绝大意义”。在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实施中,盐城,凭借其独特的战略区位优势,成为历史的焦点。

会师后,陈毅从海安到盐城慰问南下的八路军指战员,与黄克诚等众多老战友久别重逢,即赋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苏北抗日局面打开后,1940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由淮南东迁阜宁东沟,不久后抵达盐城,11月初与陈毅在海安会晤。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共同酝酿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挺抵达苏北前,陈毅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几天后,指挥部机关由海安迁驻盐城城区。

八路军、新四军胜利会师,协同完成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打通了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确立中原局和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打下基础,标志着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二 重建军部在盐城：确立华中抗战的中心地位

1940年10月,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白驹,共同开辟了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深刻改变了华中敌我的斗争局势,华中抗战呈现出新的气象。国民党继续推行“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方针,不断制造事端和摩擦。1941年1月,他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番号。皖南事变严重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抗日大局,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1月1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盐城致电中共中央: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并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这一建议很快被中共中央采纳。1月20日,在延安的毛泽东亲自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大会在盐城游艺园隆重召开,到会新四军指

战员、各界代表1000多人。刘少奇宣读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发表就职演讲。新四军军部机关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机关为基础组成。2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被统一整编为新四军7个师、1个独立旅,共计9万余人,不仅力量壮大了,而且全军的领导和指挥更加统一、更加坚强。

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是新四军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是中国抗战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此,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肩负起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历史重任。

为加强党的领导,1941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在盐城成立华中局。同月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华中党校。5月至6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华中局高级干部和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对华中高级干部进行了非常及时的思想路线教育,要求加强党性的学习和教育,加强党内统一战线教育,提高党的纪律、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策略、军事知识的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服从党的利益,执行党的政策和法令,完成党的政治任务,使华中全党全军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新四军军分会会议检查和总结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陈毅作了建军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号召华中全党全军为把新四军建成正规化的党军而奋斗。

随着华中敌后斗争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伪、顽军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夹攻封锁、“扫荡”和“清乡”,华中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事业,进入空前困难时期。为进一步统一华中根据地全党全军思想,明确对敌斗争的方针任务,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1月20日,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阜宁县开幕,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第一、第二、第四、第六师和独立旅计26名正式代表出席会议,70人列席了会议。刘少奇代表华中局作《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他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对抗战以来,特别是华中局成立以来,华中地区全党全军工作进行总结,集中分析各根据地和各部队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不足,确定华中党组织和新四军日后的总任务和9项具体任务,包括粉碎敌伪“扫荡”、党的建设、地方武装、统战工作及对敌伪工作、除奸反特务、兵工生产、建立群众团体及民主建政、财经斗争、文化教育等。3月5日,经讨论决定以刘少奇的报告作为日后的奋斗目标与行动路线。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成为华中抗战工作的重要转折点,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会后,华中各根据地全面贯彻会议精神,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力开展建军工作,全面加强部队各项建设,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和战斗力,使新四军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中共中央华中局在盐城成立,对统一党对华中各项工作的领导,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华中抗战,意义重大。党中央的战略思想和决策部署,通过华中局在各根据地、新四军中得到全面贯彻。政治委员(教导员、指导员)制度和政治工作机构不断健全和完善,成为部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坚强保证,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自此,党对华中抗日斗争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地位形成。盐城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

三 模范根据地在盐城：创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典范

“共产党和新四军将要在苏北及在华中其他敌后根据地干什么?”1941年6月,中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盐城第二届座谈会上用《我们在敌后干什么》的演说,回应地方士绅的疑问,明确表示:“我们只干两件事,一件是干抗日,一件是干民主。”盐城作为新四军新军部所在地,在刘少奇直接指导下,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坚决执行刘少奇关于“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彻底办好”,“把盐城、苏北及其他各根据地都办好,创造新的盐城,新的苏北”的指导方针,使盐城地区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鲜活样本和实践典范。

根据地开辟伊始,正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之中,根据地建设百端待举。刘少奇、陈毅凭借长期的革命实践经验与超凡的战略智慧,选择群众工作为发端,开启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1941年,盐阜区党委和刘少奇先后两次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部署发动群众抗日工作。自此盐阜区各县大刀阔斧、轰轰烈烈地开展群众工作。一方面,组建民运队深入乡村,确立中心区后,继而推广辐射;争取开明地主和士绅支持和帮助,进而组织乡、区农教会。另一方面开展借粮度春荒斗争,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推动组织农教会。截至6月底,盐城地区农教会、农教会、青教会、妇教会、学教会等群众救国团体纷纷建立,

盐阜区农救会会员达18万人。这期间,刘少奇发表《关于盐城农救工作经验给苏中区委的信》,充分肯定盐城农救工作成绩,希望其他地区借鉴学习。盐阜区行政公署与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成立后,根据华中局发出的“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号召,颁布一系列关于减租减息、减租增资的政策和法令,极大地激发农民的抗日热情。盐城地区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独树一帜,创造了华中敌后群众工作的典范,刘少奇专门作《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的报告,将盐城经验推广到晋西北乃至全国。

盐城地区各级党组织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抓紧动员各阶层人士、地主士绅参加抗日工作,切实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盐城地区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起各县参议会和政府机关,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通过拜访、书信往来、诗文合唱等方式,团结一大批党外进步人士、社会名流和民主士绅共同抗战。被誉为“苏北鲁迅”的宋泽夫了解到共产党的抗日民主主张后,极力拥护共产党,并担任盐城县参议会会长,用声望和才智发动群众抗日,以人力物力支援新四军,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作出积极贡献。此外,刘少奇、陈毅等人亲自领导建立根据地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开展以抗战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抗大五分校、鲁艺华中分院等在盐城相继诞生。一大批敌占区以及大后方的文化人士汇聚盐城,如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骆耕漠,国际问题专家钱俊瑞,作家夏征农、黄源、林淡秋、教育家白桃,卫生专家沈其震,科学家孙克定,著名记者范长江、刘述周,文艺理论家蒋天佐、艾寒松,戏剧家阿英,音乐家贺绿汀、何士德、孟波,画家胡考,木刻家赖少其,历史学家吕振羽,出版家徐雪寒,日本问题专家张百川,还有扬帆等,组成一支庞大的文化大军,成为敌后抗战的“第二战线”。盐城,一时集文化之盛,被誉为“敌后文化名城”。为方便文人集中交流,军部创造条件在阜宁卖饭曹村设立新四军“文化村”,成立湖海文艺社,创作出许多广为流传的文化作品,如贺绿汀的《1942年前奏曲》、阿英的《李闯王》等。通过这些抗战文艺活动结成最广泛的苏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蓬勃的文化抗战热潮。

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新四军千方百计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纾民困。建立新税收制度,废除苛捐杂税;建立根据地银行,发行抗币限制法币流通,废除日、伪货币;建立江淮印钞厂;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的指示,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发展部队农副业生产;开河治水、兴修水利,开挖河流,改造盐碱地。1941年修建海长堤“宋公堤”,抵御海潮侵袭,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修堤费无需民众负担,并在1943年偿清海堤建设的60万元公债,“打破了中国公债史记录”。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有力保障部队给养,改善群众生活,还使根据地经济发展趋向繁荣,为新四军持续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通过建立民主政权,提高民众抗日觉悟,维护人民权益,培育大众文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切实举措,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重建的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盐阜抗日根据地迅速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多领域协同推进的发展模式。盐城成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典范,为其他地区根据地建设提供了示范样板。

四 浴血奋战在盐城：筑牢华中敌后抗战坚强堡垒

随着1940年10月新四军挺进盐城,特别是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新四军在盐城地区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伪军多次“扫荡”,组织发起多场战斗战役,创造多个抗战经典战例,为夺取华中敌后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至1943年是新四军在盐城地区敌后抗战最困难的阶段。盐阜区粉碎了日、伪军两次大规模“扫荡”,为华中敌后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奠定了重要基础。1941年7月,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和第十五、第十二师团各一部,以及伪军李长江、杨仲华部,共1.7万人,对盐阜区发起第一次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以及第三师主力部队。新四军第一师、第三师协同作战,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连续作战135次,歼敌3000余人。日、伪军南北折返,疲于奔命,对盐阜区的第一次大“扫荡”失败。1943年2月,日军集结第十七师团、第三十五师团、第十五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及伪军共2万余人,对盐阜区发起春季大“扫荡”。此次“扫荡”是日、伪军在华中敌后的

又一次空前严重的“扫荡”,从2月末至3月初,日、伪军在盐阜区新增据点60多处。新四军第三师灵活采取“内线坚持、外线打击”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部队化整为零,以营连为单位不断袭扰、打击敌人,展开麻雀战、破袭战,痛击敌人,日、伪军频繁扑空,锐气大减。两个月的反“扫荡”中,第三师部队和盐阜军分区共作战658次,攻克敌伪据点32处。其中,单家港、陈集、八滩三次战斗规模较大,在华中敌后战场产生较大影响。单家港战斗是盐阜区反“扫荡”中杀伤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新四军第八旅第二十二团以23人的伤亡,歼灭日军260余人;陈集战斗全歼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崖畅野中队82人,创造了敌后平原攻击战与歼灭战的光辉战例,被黄克诚称赞“是第三师在盐阜区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八滩战斗是第八旅第二十四团在盐阜区痛击侵略者“最为激烈的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从1943年5月至10月,日、伪军多次对东台、台北两县进行大规模“扫荡”,在新四军第一师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以及广大民兵的英勇打击下,日、伪军对两台地区的“扫荡”均以失败告终。

1944年春,为加强太平洋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作战,日军从苏北调走部分兵力,盐城地区开展局部反攻的条件逐渐成熟,新四军展开一系列对敌局部反攻作战,取得辉煌战果。5月3日凌晨,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二十三、二十四团,第七旅第十九团等部队在副师长张爱萍的指挥下,对苏北沿海敌占重镇陈家港发起攻击,参战部队以极小代价赢得胜利,全歼守敌800余人,缴获迫击炮3门,长短枪416支,弹药3.7万发,食盐48万担等。陈家港战斗在经济上粉碎了日军长期对盐阜区海盐资源的掠夺,在政治上扩大了华中新四军的影响,打响了盐阜区局部反攻第一枪。从5月至10月,第三师部队发动沿海地区攻势作战,接连攻克合顺昌、通洋港、青龙港等据点,并解放了日军掠夺盐、棉资源的要地合德镇,打出了新四军军威。

1945年4月24日,新四军第三师以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共11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经过36小时的激烈战斗,战役取得重大胜利,阜宁成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解放的第一个县城。阜宁战役揭开华中敌后全面反攻的序幕,意义重大。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战略大反攻。9月,两淮战役后,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盐城成为苏北唯一没有被解放的县城。为拔除伪军在苏北的最后一个据点,10月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抽调苏中军区、盐阜军分区5个团共2万余人发起盐城战役。在攻克城区周边伍佑、北洋等据点后,于11月8日发起总攻。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守城伪第二方面军第一军(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改编为第二路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宣布率部起义,盐城和平解放。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文称:“现苏北全境已无敌踪”。

新四军在盐城坚持抗战达5年之久,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坚贞不拔,在激烈的战斗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创造了辉煌的战绩,盐城因此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极大鼓舞了华中敌后军民抗战的必胜信念。以第三师抗战为例,该师共对敌作战4700余次,歼日伪顽6万余人,部队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由2万余人发展到7万余人,成为一支能征善战、无坚不摧的英雄之师,在解放战争中继续成为屡建战功的主力部队。

回望历史,新四军在盐城砥柱华中、浴血抗战的光辉历史,已沉淀为这座城市最深沉的红色基因,成为盐城儿女攻坚克难的精神密码。英雄盐城的每一步跨越,都浸润着新四军革命精神的磅礴力量。202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考察盐城并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要用好这一教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传承发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盐城时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这片曾经燃遍烽火硝烟的土地上,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砥砺前行,踔厉奋发,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蓝图,谱写更加璀璨夺目的时代华章。

